



第二语言习得普遍性与变异性研究：回顾与展望

薛小梅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针对二语习得是否存在固定发展路径的争议反映出第二语言学科内部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交锋。回顾过去40多年二语习得发展路径研究的基本发现、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可以看出二语习得发展路径前期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两个维度都存在分歧。未来研究应该超越普遍性与变异性之争,厘清规律与变异的内涵,完善研究方法,探究制约二语习得发展路径的因素与机制。

[关键词] 二语习得发展路径研究;普遍性;变异性

[中图分类号] H 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8)04-0056-06

[DOI] 10.16783/j.cnki.nwnus.2018.04.007

一、引言

过去40多年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项重大发现是:二语/外语学习沿着相对固定的轨迹发展,学习者在习得语音、形态、句法等语言项目时表现出相对固定的顺序或次序,这种规律不因年龄、母语背景及学习环境而发生根本变化,因而具有普遍性^[1]。这一重大发现对二语习得早期理论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与此同时,研究者对二语习得顺序的质疑也从未中断。进入21世纪,随着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质疑者更是从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及研究价值等方面指出这类研究存在的不足。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二语习得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习得顺序。支持者则坚称,二语发展中的这种普遍规律真实存在,其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毋庸置疑^[2]。

围绕二语习得是否存在固定发展路径出现的争议,不是单纯的实证数据、研究发现的真伪之辩。究其实质,反映了二语习得学科内部不同理论范式间的激烈交锋,及不同范式下研究者研究方法的好恶取舍。回看40年,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梳理,考察其实证发现、研究方法及理论解释,探究导致存在或不存在发展路径或阶段的因素,从而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二语习得过程、机制的理解。

二、研究发现及其价值

(一) 基本发现

第二语言形态句法发展规律的研究肇始于第一语言研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学者发现儿童习得母语功能语素和句法结构时表现出普遍的发展规律^[3]。这种规律一般表现为两种类型:习得顺序规律与习得次序规律。前者指学习者在习得一系列结构时,对一些结构的习得先于另一些结构,如英语儿童习得英语功能语素时遵循了以下先后顺序:现在进行时-ing>介词in, on>名词复数-s>动词不规则过去式>所有格's>系词be>冠词>动词规则过去式>第三人称规则单数s>第三人称不规则单数>助动词>省略式系词be>省略式助词be。后者指学习者在习得某一具体结构时会经历一个分阶段的发展过程,如英语疑问结构习得表现为6个阶段。第一语言的这种发展规律引起了二语习得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掀起了二语形态句法习得顺序与次序研究的热潮,涌现出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研究团队,如德国Meisel领导的ZISA团队、Klein和Perdue负责的欧洲科学基金会项目、英国Myles的团队、瑞典Hakansson和Norrby的团队及澳洲Pienemann的团队等^[2]。

[收稿日期] 2018-04-0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15YJA740052);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2015B-019);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SKGG15016)

[作者简介] 薛小梅(1973—),女,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第二语言习得、跨文化交际研究

在诸多研究中,对英语功能语素的研究最为深入^[4]。据统计,在1973—1996年的20多年间,仅就自然学习环境下的英语语素习得顺序的研究就超过25项^[5]。如表1所示,不管母语背景如何,二语学习者在习得英语功能语素时表现出了相对固定的顺序。研究同时发现,二语学习者在习得具体结构时同样表现出相对固定的次序。在习得英语否定结构时,二语学习者表现出4个阶段,每个阶段均显示学习者在积极构建自己的二语体系。这一体系虽与英语本族语人士的语言使用不同,但始终是一个受规则制约的系统。另外,后续研究还发现学习者在习得关系从句、疑问结构和被动结构等时,同样表现出相对固定的发展阶段^[6]。

表1 二语学习者英语语素及否定结构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	语素习得顺序	否定结构习得次序
1	现在进行时-ing 名词复数-s 系词 be	将否定词 no, not 直接置于否定对象前,通常置于句首,更偏好使用 no。 No bicycle. Not my friend.
2	助词 be 冠词	交替使用 no, not 及 don't, 但 don't 无人称、数及时态变化。 He don't like it.
3	动词不规则过去式	否定词置于助动词后,但 don't 无人称、数及时态变化。 You can not go there. He was not happy.
4	动词规则过去式 第三人称单数-s 名词所有格-'s	1) don't 出现人称、数及时态变化。 It doesn't work. 2) 有时会同时改变助动词和主动词的人称、数及时态。 I didn't went there.

自上世纪80年代始,国内开始引介、反思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积极开展实证研究,探讨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7]。研究者发现,以汉语为二语的学习者在习得汉语否定结构^[8]、趋向补语^[9]、程度补语^[10]、疑问代词^[11]、副词“还”^[12]等结构时表现出类似的规律。

(二) 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从理论价值考察,第二语言发展路径研究主要有以下贡献。首先,研究为中介语概念提供了基本的实证支撑,表明中介语既不是第一语言的翻版,也不是杂乱无章的母语和二语的混合体,而是一个有自身规律的语言系统。其次,研究摆脱了上世纪50年代对比分析研究的束缚,使研究者意识到“一语二语差异=二语学习困难”的局限性,将研

究重心从对比母语与二语的异同转向系统描述分析学习者语言。第三,习得顺序研究证伪了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语言学习理论,否定了外部刺激(语言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决定性因素,为普遍语法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撑。最后,基于研究发现,研究者提出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二语习得理论,如自然顺序假说^[13]、多维模式^[14]、策略理论^[15]、可加工理论与可教性假设^[16]、多维限制模型^[17]等。

第二语言形态句法发展路径研究对二语教学实践也颇有启示。首先,二语教学重心不能仅仅关注一语与二语的差异,因为差异未必导致困难。第二,二语形态句法发展路径表现出的普遍性,让研究者提出“内在大纲”之说,即学习者二语发展遵循固有的顺序或规律,这些规律不因学习者年龄、母语背景、学习环境、教学方式不同而有所改变。第三,Pienemann的可教性假设提出,课堂教学可以改变学习速度,但是无法跨越某个发展阶段^[16]。另外,研究者及一线教师开始思考,教学大纲、教材编写、教学材料是否可以参照“内在大纲”。

总体而言,二语发展路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前期研究同时发现,二语发展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不仅不同学习者在同一发展阶段二语使用有差异,而且同一学习者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也存在语言使用差异。因此,不少学者对固定发展路径提出质疑,认为变异性才是二语发展的主要特征。

三、普遍性与变异性之争

(一) 方法分歧

从方法论层面考察,研究者对如何研究二语发展路径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分歧。

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早期研究多采用横向设计,依据样本方差和均值推断个体语言发展。反对者指出,仅在一两个时间点采集数据不能反映完整的习得过程,依据均值考察学习行为抹杀了个体差异。横向研究用样本趋势来涵盖个体语言系统的动态多因性,明显低估了个体语言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所谓的发展阶段充其量只是特定研究方法、调查工具的产物^[18]。调查二语发展路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纵向设计、个案研究,以便在较长时间维度观察个体的语言发展路径。

正确标准与出现标准。早期研究多依赖强制语境中学习者使用目标结构的正确率作为判断习得的标准。这种标准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依赖强制语

境没有考虑非强制语境中对目标结构的过度使用问题。其次,强制语境中能够使用并不意味着学习者已经理解了目标结构的功能^[5]。最后,以正确率作为习得判断标准会导致主观化,因为不同的正确率会产生不同的习得顺序。例如,对某几个特定的语言项目,采用50%和90%的正确率可能得出不同的习得顺序^[2]。鉴于此,研究者建议应该以学习者语言使用中出现某一结构为习得衡量标准。

顺序规律与次序规律。一些研究者指出,语素研究中的14个语素是性质不同的语言现象,相互之间未必有必然联系。因此,调查无关联的一组结构的习得顺序不仅没有理论意义,而且还犯有所谓的“比较谬误”之嫌^[19]。即以本族语人士的语言与二语学习者语言相比,将学习者语言视为一种偏离本族语人士的有缺陷的语言。研究应该关注次序规律,将重心放在描述学习者在习得某一具体结构时在不同阶段表现出的语言发展特征与规律。

产出数据与理解数据。前期研究多依赖学习者产出语料,对言语理解数据考察不多。研究者认为这种数据采集方法会带来如下弊端。首先,不适合调查语言中的低频结构。其次,不管是本族语人士还是二语学习者,言语产出均会因时因地不同而产生变异。二语学习者由于语言正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之中,其变异和不稳定性会放大,仅仅依赖产出数据会遮蔽语言发展的规律性^[20]。鉴于此,后续研究应该兼顾产出与理解两类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二) 理论分歧

从宏观理论层面,可将二语习得理论分为基于普遍语法的理论和基于使用的涌现主义理论两大阵营,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存在内在的语言知识^[21]。与二语形态句法发展路径研究相关的重要理论包括可加工理论、加工决定论、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动态系统理论等。我们将从是否承认先天语言知识、是否存在相对固定的发展路径及哪些因素影响发展路径三个问题入手,阐释该领域的理论分歧。

上世纪70年代,功能语素习得中表现出的固定顺序,很容易让研究者将其与先天语言知识联系起来。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已很少有研究者将发展路径直接归因于先天语言知识。上述四种理论中,只有可加工理论承认学习者拥有最低限度的先天语言知识,如语言成分概念及语义句法角色匹配等。其他三种理论均否认有任何的先天语言知识,认为语言习得是学习者在对语言使用经验分析过程

中涌现出来的,是一个多因素互动的复杂过程。

是否存在相对固定的发展路径,二语习得理论一直存有争议。可加工理论、加工决定论、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对此持肯定态度,动态系统理论则倾向于否认固定路径。该理论关于二语发展有两个重要观点^[18]。第一,二语学习是一个动态系统,具有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非线性的本质特征在于变量间的交互效应与单个变量之间不存在正比关系,如小的因素可能会导致大的结果。变量间的交互影响和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会导致系统持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结果无法预设,因此语言发展不存在固定的发展顺序。第二,变异是语言发展的发动机。非线性发展过程中,同一学习者及不同学习者之间在语言发展过程中均会表现出变异性。这种变异不是语言发展中毫无意义的副产品,而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动力。没有变异,就没有发展。大量的变异表明学习者在尝试使用语言,因此导致其语言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变异的激增往往与飞跃式的发展相吻合。当系统在重构时变异量会增加,而当系统趋于稳定时,变异量会降低。

不同理论对导致路径产生的原因同样存在分歧。可加工理论以词汇功能语法和Levelt的语言产出模型为基础,认为语言学习中存在一个由6个顺序相连的加工程序构成的普遍加工层级,从低到高依次为:词汇/词目接触程序、词类程序、短语程序、动词短语程序、句子程序和从句程序。区分不同层级的主要依据是语言成分内部和成分之间信息交换的复杂度。例如,句子程序涉及不同短语之间的信息交换,因此比短语程序复杂。这些程序具有层级蕴含关系。一般而言,学习者最初只具有低层级的加工程序,随着语言水平的提升,会依次过渡到较高层级,每个程序的形成都以前一个程序为基础。学习者在某个阶段拥有的加工程序决定了他们所能加工和产出的形态句法结构数量与类型。由于加工层级适用于所有学习者,所以语言发展具有基本相同的路径及特征^[2]。

可加工理论承认加工层级之外的其他因素会导致个体语言使用出现变异。但是,虽然个体变异无法准确预测,却同样受到加工层级的影响。依据加工层级,可以确定学习者在某一加工阶段可能使用的所有结构类型,只是无法准确判断学习者在具体语境中会选择这些结构中的某一具体结构^[17]。

加工决定论秉承涌现主义的语言习得观,认为语言发展是多种力量及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

发展路径主要与加工相关的压力有关,加工压力小的结构先于加工压力大的结构而习得。加工压力由两类因素造成。一为内部因素,指语言加工时对工作记忆产生压力或影响加工效率的语言结构形式特征;二为外部因素,包括输入分布特征、语义等因素。与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不同,加工决定论认为输入等外部因素仅仅是影响语言习得的一个因素,并非决定因素,真正决定语言发展的是加工压力。但是,由于内外部因素交互发生作用,有时会遮蔽加工压力效应,产生一定的变异性^[20]。

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语言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基于使用的。语言是人类语言经验的认知组织结构,语法是语言使用中形成的一个范畴网络,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形式—意义相匹配的构式。人的语言能力是其应用一般认知能力,在对语言使用经验分析过程中涌现出来的^[22]。构式习得经历了一个从组块(chunk)到低层次的类型(low-scope pattern)再到抽象构式的由简到繁、自下而上的基于样例的统计学习过程,反映形式与功能匹配的发生概率^[23]。二语形态句法发展路径的决定因素是语言输入分布特征及具体学习环境。例如,Eskildsen 调查了两位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对英语疑问结构的习得,发现学习者在不同阶段使用的结构与其接触的语言输入有直接的关系。在课堂语言互动过程中,学习者通过所接触的语言样例,跳出单一的套语使用,生成抽象程度不等的图式化构式^[24]。

上述三种理论对影响发展路径的决定因素持有不同看法。两种强调加工的理论均从语言本体出发探究制约发展路径的因素,认为语言特征造成的加工压力是决定因素。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则从外部因素入手,强调输入分布特征在语言习得中的重要作用。不同因素均可部分解释学习者习得行为,但又都有其局限性。可加工理论的加工层级能较好解释涉及不同层级的语言学习过程,对同一加工层级的语言现象则难以解释。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对高频结构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但对低频结构或无显著频率差别结构的解释不够理想。加工决定论将形式、意义层面产生的加工压力均考虑进去,但又缺乏像可加工理论那样细致统一的形式分析,操作性不够成熟。综上所述,一个成熟的二语发展路径需要将语言本体特征、语言输入分布特征及学习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强调或排斥任何一个方面均可能提供一个片面的解释框架。

四、未来思考

二语发展路径研究历经 40 多年而未有定论,深刻反映出第二语言习得的复杂性。基于前期研究,我们认为后续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一) 超越普遍性与变异性之争

围绕第二语言形态句法发展是否存在固定路径的争议,其实质是研究者对语言系统的理解存在争议,而这种争议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公元前 3 世纪末期,古希腊亚历山大学派与帕加马学派就语言的系统性与规则性引发争议,形成所谓的“规则派”和“异常派”。前者强调语言的系统性与规则性,后者认为不能摒弃不规则、例外的语言现象,研究应该关注不规则词汇等的研究^[25]。语言学研究发展到现代,索绪尔“语言”与“言语”、乔姆斯基“语言能力”与“语言行为”等的区分,无不隐含着语言普遍性与变异性两个层面。两位语言学家尽管角度不同,但“语言”、“语言能力”均指向规则、系统的一面,而“言语”、“语言行为”则蕴含着具体语言使用中的个体变异。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26]。而乔姆斯基更是提出,应该研究被理想化了的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语言知识^[27]。因此,规律性与变异性是语言的存在形式,二者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离开普遍规律探讨个体变异,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反之,摒弃变异一味追求规律,无疑会扭曲语言事实,臆造出毫无解释力的所谓普遍规律。

探究规律,无疑会在方法论上涉及对研究对象的理论化。Ellis 就曾敏锐指出,规律与变异之争,反映出研究者对“理想化”持有不同的态度^[2]。可加工理论代表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研究,而动态系统理论则反映出一种去理想化的研究。科学研究中,尽管有必要去理想化,但没有必要抹杀理想化在科学研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二语习得中的发展路径无疑是理想化之后的产物,对二语习得和教师教育有着重要价值。

(二) 区分不同类型的变异与规律

变异和规律是对立统一体。后期研究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哪些变异真正构成对规律的挑战,而哪些变异仅仅是规律被某种因素遮蔽后的表现。例如,不同学习者语言发展的速度有快有慢,所能达到的语言水平也有高有低。但是,这种因发展速

度、最终语言水平不同而表现出的变异，并不构成对语言发展路径一致性的挑战，因为速度、水平、路径本身就是不同的概念^[20]。

其次，早期提出的二语发展路径规律，往往是一种不受年龄、学习环境及母语背景影响的高度理想化的规律。但 40 多年的研究发现，不受任何变量制约的发展路径并不多见。例如，Luk 和 Shirai 发现，母语不同的学习者在功能语素习得中表现出不同的习得顺序。由于汉语、韩语和日语中没有名词复数和冠词，因此母语为以上三种语言的英语学习者对这两个语素的习得要滞后于母语为西班牙语的学习者^[28]。这一发现充分说明母语会影响习得顺序。

基于这一考虑，我们认为后期研究有必要区分强式规律与弱式规律。前者指不受年龄、学习环境、母语背景、输入等因素影响形成的固定发展路径，后者则指可能会因某种因素而发展改变的相对固定的发展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二语习得中的发展路径大多是类似这种情况的弱式规律。弱式规律虽然不如强势规律具有普遍性，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不同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二语发展过程及路径。

（三）完善方法，探究二语路径发展的影响因素

二语发展路径研究备受质疑，与其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有很大关系。后续研究在研究设计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首先，研究设计应该以纵向研究为主或纵横结合，对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行为进行较长时间的观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勾勒出学习者二语发展的完整轨迹。第二，应进一步界定习得标准。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将语言产出与语言理解相结合，

改变过去单纯依赖产出标准的情况。就产出而言，应该将出现率与正确率相结合，全面衡量学习者对具体结构的掌握情况。最后，研究重心应该在习得次序上，即调查学习者在习得某一语言现象时分阶段的发展规律。

不同理论在解释二语发展路径时给不同变量赋予不同权重。加工理论关注的是语言本体特征，基于使用的理论主要强调语言输入等外部因素，而动态系统理论则强调多因性，认为不存在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认为，不管是关注普遍规律还是个体变异，均需将语言本体因素（语音特征、形态句法特征、语义语用特征等）、语言输入因素（齐普夫分布、类型频率、样例频率等）及语言学习环境（社区语言使用、课堂教学等）等因素纳入考察。研究中不仅要考察这些因素之间的共时互动效应，还需从历时角度调查不同因素在不同阶段发挥的不同作用。后续研究不应是简单地否定或支持某种普遍性或规律性，更重要的任务是探究导致出现规律或变异的原因，并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

五、结语

普遍性与变异性是第二语言发展过程的两个维度，二者对立统一，相互依存。前期关于二语发展路径的研究，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存有瑕疵，在理论上颇多争议，但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二语习得过程及机制的认知。后续研究应该超越普遍性与变异性之争，重新审视普遍规律与个体变异的内涵，完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导致普遍性与变异性的内外因素，提出真正具有解释力的二语发展理论。

〔参考文献〕

- [1] Pienemann, M. An Outline of Processability Theory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Other Approaches to SLA [J]. [Special Issue]. *Language Learning*, 2015, 65, 123—151.
- [2] Ellis, R. Researching acquisition sequences: Idealization and de-idealization in SLA [J]. [Special Issue]. *Language Learning*, 2015, 65, 181—209.
- [3] Brown, R. A first Language: The Early Stage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4] Dulay, H. C., & Burt, M. K. Should we teach children syntax? [J]. *Language Learning*, 1973, 23, 245—258.
- [5] Goldschneider, J. M., & DeKeyser, R. M. Explaining the “natural order of L2 morpheme acquisition” in English: A meta-analysis of multiple determinants [J]. *Language Learning*, 2001, 51, 1—50.
- [6] Gass, S. & Selinker, 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 Introductory Course (3rd edi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8.
- [7] Hatch, E. & Wagner-Gough, J. 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的顺序和变异 [J]. 陆锦林译. 国外外语教学, 1986, (2): 36—43.
- [8] 王建勤. “不”和“没”否定结构的习得过程 [J]. 世界汉语教学, 1997, (3): 92—100.
- [9] 钱旭菁. 日本留学生汉语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 [J]. 世界汉语教学, 1997, (1): 94—101.



- [10] 王松, 刘文攀. 外国学生程度补语句习得顺序考察 [J]. 海外华文教育, 2015, (1): 104—109.
- [11] 丁雪欢. 留学生疑问代词不同句法位的习得顺序考察 [J]. 汉语学习, 2006, (5): 47—53.
- [12] 高顺全. 多义副词“还”的语法化顺序和习得顺序 [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11, (2): 39—45.
- [13] Krashen, 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2, 54—87.
- [14] Meisel, J. M., Clahsen, H., & Pienemann, M. On determining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natural second languages acquisition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81, 3, 109—135.
- [15] Clahsen, H. The acquisition of German word order: A test case for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In R. Andersen (Ed.), *Second Language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C].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1984, 219—242.
- [16] Pienemann, M.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Processability Theory*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8, 10—21.
- [17] Lenzing, A. Exploring regularities and dynamic systems in L2 development [J]. [Special Issue]. *Language Learning*, 2015, 65, 89—122.
- [18] Lowie, W., & Verspoor, M. Variability and vari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rders: A dynamic reevaluation [J]. [Special Issue]. *Language Learning*, 2015, 65, 63—88.
- [19] Bley-Vroman, R. The comparative fallacy in interlanguage studies: The case of systematicity [J]. *Language Learning*, 1983, 33, 1—17.
- [20] O'Grady, W. Processing determinism [J]. [Special Issue]. *Language Learning*, 2015, 65, 6—32.
- [21] Hulstijn, J. H. Discussion: How different can perspectives on L2 development be? [J]. [Special Issue]. *Language Learning*, 2015, 65, 210—232.
- [22] Behrens, H. Usage-based and emergentist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J]. *Linguistics*, 2009, 47, 383—411.
- [23] Ellis, N. C. Frequency effects in language processing: A review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language acquisition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2, 24, 143—188.
- [24] Eskildsen, S. W. What counts as a developmental sequence? Exemplar-based L2 learning of English questions [J]. [Special Issue]. *Language Learning*, 2015, 65, 33—62.
- [25] 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9—10.
- [26]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26.
- [27] Chomsky, N.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28] Luk, Z. P., & Shirai, Y. Is the acquisition order of grammatical morphemes impervious to L1 knowledge? Evidence from the acquisition of plurals, articles, and possessive's [J]. *Language Learning*, 2009, 59, 721—754.

Revisiting the Universality and Variability of L2 Development: Its Past and Future

XUE Xiao-m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Whether there exist fixe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reflects the debates between different theoretical paradigm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The paper represents a state-of-art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L2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in the past 40 years. It starts with a critique of the basic findings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as well as their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edagogical significance. Then, it pinpoints their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troversies.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transcend the dichotomy between universality and variability, delineate what order and variability means, and improve methodological designs and technique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nd mechanisms behind L2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Key words] L2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universality; variability

(责任编辑 周蓉/校对 小舟)

